

冷战史新研究视域下的 非洲对外关系史^{*}

孙 遇 洲

内容提要 冷战史新研究为书写非洲对外关系史提供了新机遇，也对学者在史料运用和研究视野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通过梳理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重点阐释以下三个研究新动向：第一，多类别史料的运用，尤其是对来自非洲国家档案文献的获取和使用；第二，去中心化的研究思路，强调非洲国家内部政治与外交的互动；第三，多维度的研究内涵，重视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对非洲开展对外交往的影响。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开展冷战时期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有助于反思冷战思维对当今国际社会施加的持续作用力。

关键词 冷战史新研究 非洲对外关系史 中非关系 去殖民化

作者简介 孙遇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上海 200082）。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一种被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 Gaddis）称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学术潮流逐渐兴起。^①苏联解体后，由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大批档案对外开放，推动冷战史研究进入新阶段，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美苏两国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国，开始从两个阵营的角度反思冷战缘起与本质。2000 年，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冷战史

* 本文是在 2020 年 10 月上海大学举办的“冷战时期的中国与第三世界”学术工作坊发言稿基础上整理完成，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1PJC016）的资助。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1–295;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3—22 页。

新研究尚不能称为一种研究方法，更不是一个学术流派。^① 冷战史应被视为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组成部分，其最显著特征不是军事和战略对抗，也非欧洲中心，而是“第三世界”的政治与社会变迁。^②

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与早期中非现代关系史研究

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最先提出“第三世界”概念，意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阶级”。万隆会议后，“第三世界”常被用于描述冷战时期政治上保持中立、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③ 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划分最早源自毛泽东于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思想，即独立于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之外，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革命斗争，决定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前途。^④ 马克·阿特伍德·劳伦斯（Mark Atwood Lawrence）曾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极为复杂，中国一方面强调自己属于第三世界阵营，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扩展海外影响力。^⑤ 有学者解读，这种表面矛盾体现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身份和世界地位”。^⑥

近年来，关于冷战时期中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这为理解中国的国家身份与对外政策复杂演变提供了崭新视角。杰里米·斯科特·弗赖德曼（Jeremy Scott Friedman）从苏联与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入手，发现苏联共产党以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终极任务，中国共产党则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议程作为其与后殖民国家交往的指导思想。^⑦ 裴斗虎（Gregg Brazinsky）梳理了冷战时期中美两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历史，指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致力于扩

-
- ① Odd A. Westad, “Introduction: Review the Cold War,” in Odd A.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 5.
- ② Odd A.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2000, pp. 551–565; [挪]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夏亚峰：《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第107—117页。
- ③ Robert J. McMahon, “Introduction,” in Robert J. McMahon (ed.),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
- ④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8页。
- ⑤ Mark Atwood Lawrence, “The Rise and Fall of Nonalignment,” in Robert J. McMahon (ed.),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p. 145.
- ⑥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第28页。
- ⑦ Jeremy Scott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大自身影响力和提高国际地位。^① 国内学者李潜虞则关注中国与亚非会议的关系演变，即如何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向反美统一战线转变，再到“两面开弓”的反美反苏并重统一战线。^② 上述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中美、中苏双边关系对各国制定非洲政策的指导意义，但对理解和区分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略有欠缺。

1949—1979 年，中国对非政策与中非关系受制于冷战这一历史背景，但也被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诉求所塑造，从而促进了中国对国家身份和国际体系的理解。20 世纪 70 年代初，针对中国开展的对非反帝革命外交，西方学界出版了 4 部有影响力的专著。^③ 考虑到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反共倾向，这些专著较为客观地阐释了中国对非政策的内在驱动，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不同阶段中非关系的影响因素。除了传统的外交研究，学界还有关于中国、苏联对非援助的比较研究，以及坦赞铁路专题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④ 20 世纪 80 年代末，菲利普·斯诺（Philip Snow）指出，探究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对非政策应当基于南南合作的分析框架，其本质是毛泽东时期革命外交的另一种延续。^⑤

以上研究成果均出版于冷战时期，不仅史料来源相对单一，而且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叙事。随着冷战史新研究逐渐兴起，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迎来新机遇，但也对学者在史料运用和研究视野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将总结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从以下三个角度阐释与分析冷战史新研究视域下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多类别史料的运用，尤其是对非洲国家档案文献的获取与使用；第二，去中心化的研究思路，从非洲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出

① Gregg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 - 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② 李潜虞：《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1955—1965）》，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年版。

③ Bruce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 - 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George Yu, *China's Africa Policy: A Study of Tanzania*, New York: Praeger, 1975; Alan Hutchison,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75; 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 - 19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④ Warren Weinstein (ed.), *Chinese and Soviet Aid to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1975; Warren Weinstein and Thomas H. Henriksen (eds.), *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African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80; George T. Yu, "Working on the Railroad: China and the Tanzania - Zambia Railway," *Asian Survey*, Vol. 11, No. 11, 1971, pp. 1101 - 1117; Martin Bailey, *Freedom Railway: China and the Tanzania - Zambia Link*, London: Rex Collings, 1976; Richard Hall and Hugh Peyman, *The Great Uhuru Railway: China's Showpiece in Africa*, London: Gollancz, 1976.

⑤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8.

发,理解非洲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第三,多维度的研究内涵,既丰富了“东方—西方”“北部—南部世界”的二元划分,也有利于我们反思冷战思维对当今国际社会的深刻影响。

综合运用多类别史料

由于多国档案文献的发掘与利用,冷战史新研究得以迅速发展。^①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而言,有学者提出外交史在西方学界已经被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所取代。^②即使是当代中国外交史,在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调整时,内部动因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非关系不仅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还涉及国际政治格局与其他政治力量。遗憾的是,目前国内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依然基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脉络,对非洲大陆自身历史叙事的理解过于简化,也未能有效地比较不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④这就要求非洲史学者更多地参与冷战时期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开展多学科和跨区域对话。

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摆脱殖民统治而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因此它们的国家档案均属于广义上的“后殖民档案”(Postcolonial Archive)。这些国家档案或因管理不善被非洲国家所忽略,或因客观环境遭到破坏而残缺不全,或因执政党的现实考量而不对外开放。档案获取难度可以说是进行现代非洲史研究的重大阻碍,使非洲史学者在获取史料方面落后于其他历史界同行。著名非洲史学家路易斯·怀特(Luise White)曾提到,1960年后的非洲史研究主要依靠西方国家的档案、报纸以及真实性存疑的个人传记,这一状况导致有学者悲观地认为非洲后殖民时期史料是“散乱的、偶然的和局部的”。^⑤借用安娜·劳拉·斯托勒

-
- ① 梁志:《近十余年中国冷战史研究新气象》,《世界历史》2012年第4期,第111—119页;孙丽萍:《文安立与全球视野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5期,第33—35页。
- ② 徐国琦:《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角度推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71—74页。
- ③ 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如何利用多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24—28页。
- ④ 蒋华杰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基于国内档案完成的,也是最全面的中非现代关系史研究,但并没有使用非洲国家档案,参见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0—1978)》,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 ⑤ Luise White, “Introduction—Suitcases, Roads, and Archive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frica after 1960,” *History in Africa*, Vol. 42, 2015, pp. 265–266.

(Anna Laura Stoler) 对殖民时期档案性质的理解, 作为“知识生产的场域”, 后殖民时期档案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实体, 它的开放程度同国家权力、组织结构紧密相关。^① 那么, 该场域中的相关活动也是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而需要非洲史学者突破重重阻碍, 以更有创造力的方式探索和挖掘多元史料。

近二十年来, 受益于非洲国家和专业机构的档案开放工作, 冷战时期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其中南非是最为杰出的代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简称“非国大”) 组建起新的南非政府, 并在《南非国家档案法》的指导下, 于 1996 年设立南非国家档案馆 (NASA), 主要负责比勒陀利亚、布隆方丹和开普敦的档案库与记录中心, 伊丽莎白港、彼得马里茨堡和德班的存储库则交由省级立法机构保管。^② 除了规范档案移交和管理程序, 南非新档案法极大地扩展了获取档案的时间范围, 任何公民有权免费访问超过 20 年的历史档案。^③ 近年来, 南非国家档案馆积极收集具有国家意义且历史价值较高的非公共文件, 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国家口述史项目。^④ 国内学界除了几篇国别研究以外,^⑤ 只有《非洲国家档案工作近期特点评析》一文从宏观角度归纳了非洲国家档案工作的基本特点。^⑥ 不同于档案从业人员较为关注非洲国家的档案建设与管理, 基于实地调研和使用非洲国家档案的研究经历, 笔者将介绍肯尼亚和赞比亚有关中非现代关系史的历史档案。

同其他非洲国家相比, 肯尼亚和赞比亚的国家档案馆没有因战争或政权更迭等因素而损毁, 其馆藏档案覆盖殖民时期到独立以后。赞比亚国家档案馆尚未实

① Ann Laura Stoler, “Colonial Archives and the Arts of Governance,” *Archival Science*, Vol. 2, 2002, pp. 87–109.

② 南非国家档案馆: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za/aboutnasa_content.html.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1910 年以来, 南非政府以及前德兰士瓦省的档案都保存在比勒陀利亚国家档案馆。

③ 以下三种情况不适用此项规定: 第一, 非公开记录, 即那些由私人或非政府机构创建或接收的记录有权对公众关闭; 第二, 如档案的实际状况比较脆弱, 国家档案管理员可以拒绝公众访问; 第三, 所有涉及“敏感记录”的档案, 国家档案管理员有权关闭访问权限。参见 Joanne L. Duffy, “Us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 Planning a Research Trip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istory in Africa*, Vol. 30, 2003, pp. 421–430.

④ 李文栋:《南非档案工作掠影》,《中国档案报》2010 年 7 月 15 日, 第 3 版。

⑤ 王茂法等:《保存历史记忆 强化科学管理——土耳其、南非档案工作考察访问侧记》,《浙江档案》2015 年第 7 期, 第 25—27 页; 金波等:《马达加斯加国家档案馆建设探析》,《北京档案》2016 年第 10 期, 第 36—40 页; 谭必勇、李晓冉:《南非公共档案馆转型之路》,《上海档案》2017 年第 11 期, 第 37—39 页。

⑥ 黄霄羽、田宁宁:《非洲国家档案工作近期特点评析》,《档案与建设》2019 年第 7 期, 第 36—40 页。

现电子化管理,但它收藏了较为丰富的外交部档案,并且年份覆盖范围相对较广,其中涉及中国的档案主要集中于官方互访及双边协议、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根据赞比亚《1969 年国家档案法》的规定,所有档案应在 20 年保护期后对外开放,但一些保密文件至今仍未对外公开。^① 赞比亚第二共和国时期,除了收录与坦赞铁路有关的报告外,几乎没有任何涉及中国的公开档案。肯尼亚国家档案馆则面临员工短缺、档案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但是它的馆藏较为丰富,对外开放程度很高,档案数字化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② 其中,涉及中国的外交档案相对有限,但该国商务与工业等部门保存了较多对华贸易的详细数据和经济技术援助资料。

除了国家档案馆,非洲国家执政党的党史馆同样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并未受到学者们足够重视。例如,关于 1972 年后的中赞关系,赞比亚国家档案馆的记录严重不足,但 1964—1991 年执政的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 UNIP) 的党史馆弥补了这一不足。1991 年大选落败后,联合民族独立党保管的档案资料曾一度被外界所忽略,其档案管理条件十分恶劣,直到英国图书馆开启“濒危档案计划”(Endangered Archives Programme)才使情况得以好转。^③ 笔者曾实地走访过位于卢萨卡和伦敦两地的联合民族独立党档案馆,获得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与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党际交往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赞比亚领导层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另外,南非共产党的数字档案库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非洲国家党史馆。

从事中非现代关系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在整理和挖掘中国档案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例如,姚百慧所著《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第二版)详细梳理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各类档案,本文概不赘述。^④ 除了研究对象国的档案,西方国家的档案也是非洲史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相较于非洲国家档案工作的危机频现,这些“大都会档案”拥有相当完善的数据库检索系统,而且出于维护本国海外利益的

① P. M. Mukula,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Zambia: A More Than Three - Decade Service of the Memory of the Party, Its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 1947 - 1981*, Lusaka: National Archives of Zambia, 1982, p. 7.

② Matthew Carotenuto and Katherine Luongo, "Navigating the Kenya National Archives: Research and Its Role in Kenyan Society," *History in Africa*, Vol. 32, 2005, p. 445. 黄霄羽、田宁宁:《非洲国家档案工作近期特点评析》,第 38 页。

③ "Preserving 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 of Zambia (EAP121)," Endangered Archives Programme, British Library, <https://eap.bl.uk/project/EAP121> [2021 - 08 - 08].

④ 姚百慧:《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第二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23—345 页。

需要，它们对非洲国家保持密切而持久的关注，档案开放程度也非常好。多年来，位于伦敦郊区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被各国学者争相访问，其中自治领事务部、外交部以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馆藏同现代中非关系史研究的联系最为紧密。^① 位于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则是另一个被海内外冷战史研究学者所熟知的重要档案馆。^② 该档案馆存有大量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领馆的往来电报、内部备忘录和专报，不乏对非洲国家重要政治人物的活动记录与评价。当然，这些档案本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美国外交档案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烈，其关于中国与非洲交往的记录需要在具体历史背景下辩证地分析和使用。

除了官方档案以外，非洲报纸也为丰富冷战时期非洲对外交往的历史细节提供了较为重要依据。例如，《东非旗帜报》（*East African Standard*）是肯尼亚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它与《民族日报》（*Daily Nation*）一起成为肯尼亚乃至东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日报，尤其受到城市读者的欢迎。^③ 由于这两份报纸的主编与英国驻肯尼亚使领馆保持着密切往来，它们对中国采取的政治立场差异不大，基本反映了肯尼亚亲英派领导人的态度。考虑到肯尼亚白人定居者数量较多，《东非旗帜报》不可避免地服务于白人群体的政治倾向与阅读趣味，它关于中国女性服饰的报道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④ 《赞比亚时报》（*Times of Zambia*）最初创建于北罗得西亚铜带省，1965—1972 年该报由英国罗荷集团（Lonrho）所有，1975 年被联合民族独立党接管，该党拥有直接任命报纸总编辑的权力。^⑤ 20 世纪 70—80 年代，卡翁达政府能够直接干预《赞比亚时报》的新闻报道，这也使该报排除了有关赞比亚内政外交的负面评论或者质疑。相比之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东非旗帜报》则享有更多的新闻自由，其涉华报道经常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尤其是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争论。^⑥

最后，口述传统是对非洲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对中非现代关系史研

① 关于英国外交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档案，参见姚百慧：《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第二版），第 107—131 页。

② 关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见姚百慧：《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第二版），第 2—45 页。

③ Gerard Loughran, *Birth of a Nation: The Story of a Newspaper in Kenya*, London: I. B. Tauris, 2010, pp. 18–19.

④ “Chinese Women’s Fashion Choice—Baggy Trousers,” *East African Standard*, December 24, 1965.

⑤ Francis Peter Kasoma, *The Press in Zambia: The Development, Role and Control of National Newspapers in Zambia, 1906–1983*, Lusaka: Multimedia Publications, 1986.

⑥ “Debate Opens on African Socialism: Confusion Costly to Kenya—Mr. Mboya,” *East African Standard*, May 5, 1965.

究也有重要意义。^① 有关口述史在现代非洲史研究中的应用，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由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领衔的“英联邦口述历史项目”（Commonwealth Oral History Project），包含了对英联邦 60 多位重要人物的采访，共涉及 17 个非洲国家，这些采访对理解 1965 年以来英国与南部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做出较大贡献。^② 此外，牛津大学乔斯林·亚历山大（Jocelyn Alexander）教授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课题——冷战时期的“全球士兵”研究，旨在探索冷战时期“全球士兵”的历史，重点关注苏联与南部非洲解放军之间的互动关系。^③ 笔者也曾多次深入采访赞比亚资深政治家弗农·姆旺加（Vernon Mwaanga）和马克·乔纳（Mark Chona）。另外，一些非洲国家重要政治人物传记也构成了中非现代关系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例如，姆旺加的个人传记包含了对赞比亚重要外交事件的详细记述，这有助于理解非洲国家与外国交往的内在驱动力。^④ 另外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传记来自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前秘书长亚历山大·格雷·祖鲁（Alexander Grey Zulu），这本传记较详细地记载了中国对赞比亚国防军的援助与训练。^⑤ 但上述传记因出版于赞比亚本地，并未受到国际非洲史研究界的足够重视。

去中心化的研究思路

回顾中非现代关系史的早期研究，多数作者以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几乎只讨论国家间权力平衡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冷战史新研究既借鉴了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成果，还格外关注思想、文化与社会流动等要素。冷战意味着全球秩序的二元结构，在此秩序下，每个政治团体都在追求或被迫追求某种既定的发展道路，但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对等。历史人类学家权宪益（Heonik Kwon）曾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冷战研究过度关注“权力角逐”（Contest of Power），忽略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Relation -

① 有关口述传统或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对非洲史的作用，参见〔比利时〕简·范西纳：《作为历史的口头传说》，郑晓霞等译，张忠祥、郑晓霞校译，上海三联书店 2020 年版。

② 参见“英联邦口述历史项目”网址：<https://commonwealthoralhistories.org/>〔2021 - 08 - 10〕。

③ “Jocelyn Alexander Wins Leverhulme Grant for Project on Cold War - era ‘Global Soldiers’,” July 31, 2019, <https://www.qeh.ox.ac.uk/news/jocelyn-alexander-wins-leverhulme-grant-project-cold-war-era-global-soldiers>〔2021 - 08 - 15〕。

④ Vernon J. Mwaanga, *An Extraordinary Life: A Passion for Service*, Lusaka: Fleetfoot Pub. Co., 2009; Vernon J. Mwaanga, *The Long Sunset: My Reflections*, Lusaka: Fleetfoot Pub. Co., 2008.

⑤ Alexander Grey Zulu, *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Grey Zulu*, Ndola: Times Printpak Zambia, 2007.

of - Domination)。① 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恰恰构成了“另一种冷战”，它根植于具体的地方因素，由一个个普通民众的亲身经历所构成。② 权宪益的研究对象虽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他强调根植于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研究视角，这对理解冷战时期非洲国家的对外交往十分必要。

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意味着去殖民化进程的开始。地方性动力深刻塑造了后殖民时期的社会，但它却先于世界体系的变化而存在。印度著名左翼学者、历史学家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就挑战了霸权秩序这一概念，他关注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思想创见，并认为它们拥有一种妥协的意识形态，如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印度萨尔乌达耶和印尼指导式民主等，并将追求平等的愿景与维持社会等级相结合。③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盛行，这种意识形态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它主要是由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推行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点关注整个非洲大陆的身份认同，声称其价值观根植于非洲传统社会，并且在外交事务上遵循“不结盟”原则。④ 笔者曾将赞比亚人文主义（Zambian Humanism）和肯尼亚非洲社会主义（Kenyan African Socialism）进行比较，证明即使同为非洲国家，但受政治环境、族群关系及宗教信仰的影响，两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也不尽相同。⑤

关于冷战史新研究对“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挑战，不得不提及历史学的“全球转向”。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与全球化发展，历史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打破原有的框架思维，打通关联区域，探讨长时段、跨文化和跨区域的历史现象，其中冷战史和后殖民国际关系史受“全球转向”的影

① Heonik Kwon, *The Other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Nick Cullather, “Narratives Are All We Have and All We Will Ever Have—Review of *The Other Cold War*,” *H - Diplo Roundtable Review*, Vol. XIII, No. 6, 2011, p. 11.

③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New Press, 2007, p. xvii.

④ 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研究，参见 William H. Friedland and Carl G. Rosberg (eds.), *African Soci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Carl Gustav Rosberg and Thomas Callaghy (eds.), *Social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A New Assessment*,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David Ottaway and Marina Ottaway, *Afrocommunism*, New York: Africana, 1981.

⑤ Jodie Yuzhou Sun, “Historicizing African Socialisms: Kenyan African Socialism, Zambian Humanism, and Communist China's Entanglem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52, No. 3, 2019, pp. 349 - 374.

响最为显著。^① 通过研究去殖民化（1956—1975）和冷战（1945—1991）这两个时间重叠的历史事件，伊丽莎白·施密特（Elizabeth Schmidt）发现，冷战时由大国干涉非洲引起的冲突更为致命，影响也更为深远，其中涉及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和刚果危机的研究则是最为典型的代表。^② 早期研究者将阿尔及利亚独立作为法国帝国史的分支，但以马修·康纳利（Matthew James Connelly）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较为注重“冷战、大众传媒、移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重因素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塑造。^③ 1960—1965年刚果危机爆发，这也是非洲大陆首起因意识形态对抗而产生的“热战”，里斯·纳米卡斯（Lise A. Namikas）利用美苏两国的历史档案，生动展现了该国首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如何受到“帝国主义和冷战政治”的双重迫害。^④

传统的冷战史研究将非洲塑造成大国争夺的对象，而冷战史新研究则强调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动性。近几年，关于赞比亚、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安迪·德罗奇（Andy DeRoche）围绕卡翁达总统的外交成就，证明了赞比亚对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贡献。^⑤ 波比·卡伦（Poppy Cullen）揭示了1963—1980年政治精英的思想及其活动对肯尼亚与英国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⑥ 马特奥·格里利（Matteo Grilli）考察了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统治期间加纳的泛非主义外交政策，即通过非洲事务局、非洲事务中心和恩克鲁玛意识形态研究所，加纳如何影响非洲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⑦ 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聚焦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探讨了全球冷战、非洲解放斗争和坦桑尼亚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联

-
- ① Jeffrey James Byrne, "Reflecting on the Glob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Being a Historian of Nowhere," *Rivista italiana di storia internazionale*, Vol. 1, 2018, pp. 11–42. 另参见刘文明：《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第4—10页。
 - ② Elizabeth Schmidt,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Africa: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
 - ③ Matthew James Connelly, *A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④ Lise A. Namikas, *Battleground Africa: Cold War in the Congo, 1960–1965*,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 3.
 - ⑤ Andy DeRoche, *Kenneth Kaun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Bloomsbury, 2016.
 - ⑥ Poppy Cullen, *Kenya and Britain after Independence: Beyond Neo-Coloni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⑦ Matteo Grilli, *Nkrumahism and African Nationalism: Ghana's Pan-Af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Decoloniz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系。^①在此基础上,中非现代关系史研究应该充分展现非洲国家如何顺应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律,寻求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多领域、多层次互动,这种研究倾向有利于揭示中非关系演变并不是受到外部势力操纵,也并非总是符合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而是非洲国家同中国之间不断了解、磨合、互动和妥协的过程。换言之,中非现代关系史并不是一种以中国史为绝对导向的对外关系史,也要考虑非洲史研究角度。

多维度的研究内涵

关于冷战史新研究视域下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涵,需要学者们不断丰富和充实。首先,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并不是非洲国家各自历史的简单堆砌。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以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非洲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塑造。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核心是纠正世界史研究的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倾向,这对树立非洲人民自信以及构建非洲国家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②但这种历史叙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受到批判,一群被称为“激进的悲观主义者”采用阶级分析、依附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结构主义方法论,借由全球资本解释他们对非洲政局的失望。^③同时,新殖民主义成为被普遍批判的对象。^④随着冷战结束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学术界重新回顾与反思了非洲现代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李安山指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为了迎合现实需要而寻找历史根据的做法,存在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倾向。^⑤一部内涵丰富的非洲对外关系史应该辩证地看待民族独立与社会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

其次,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不是理解当代非洲的唯一因素,还需重视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对现代中非关系的影响。正如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所言,冷战、去殖民化和全球社会觉醒这三大动因,是理解后殖

① George Roberts, *Revolutionary State – Making in Dar es Salaam: African Liberation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1961 – 19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② Terence Ranger (ed.), *Emerging Themes in African History: Proceedings*, Nairobi: East Africa Pub. House, 1968.

③ Bill Freu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ociety Since 180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 关于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体现,参见 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London: Bogle – L' Ouverture Publications, 1972.

⑤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世界历史》2020 年第 1 期,第 139 页。

民时期非洲国家的“历史交叉点”。^①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对非政策被种族主义渗透，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对非政策被认为是服务于反殖反帝的外交总方针。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苏联领导人便担心中国提出的以反对白人种族统治（包括苏联在内）为基础的第三世界同盟，而这种担心在某种意义上被夸大了。由于中非民间交往的紧密度和覆盖范围依然有限，双方需要依靠文学、艺术等文化交流构建彼此印象，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误解与偏见。^② 此外，非洲国家之间也存在民族与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这对它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必然会造成影响。

最后，在冷战史新研究视域下，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绝不是将非洲国家和人民视为大国政治斗争的代理人或受害者，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非洲与他国的交往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考虑到非洲人长久以来被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研究的主体，新时代中非关系史研究更应吸取冷战时美苏等国对非关系的教训，高度警惕将非洲看作是“中国模式”的被动改造方这种陷阱，妥善处理好中国与非洲的平等伙伴关系。^③ 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既丰富了“东方—西方”和“北部—南部世界”这种二元划分，也利于我们反思冷战思维对当今国际社会施加的持续作用力。

余 论

本文论述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史新研究提出以来，国内外有关非洲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内涵方面都呈现出新特点，并取得显著成果。然而，相对于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冷战时期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应当充实与完善知识结构，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国内外交流，开展多学科、跨区域对话。在此，笔者提出一些浅见：首先，在史料收集与整理方面肯下功夫，冷战时期非洲对外关系史研究本质上是一个多边问题，需要学者认真挖掘和耐心梳理来自非洲和其他地区

① Jeremi Suri, “The Cold War, 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Social Awakenings: Historical Intersections,” *Cold War History*, Vol. 6, 2006, pp. 353–363.

② Barry Sautman, “Anti-Black Racism in Post-Mao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8, 1994, p. 414.

③ 李安山：《中非经济关系——历史、现状与思考》，《非洲深度透视》2021 年第三期，2021 年 10 月 3 日。

的多类别史料。^① 另外，考虑到非洲研究尤其是非洲史研究的特殊性，若条件允许，相关单位和学术机构应当为研究人员从事海外田野调研提供政策保障。^② 其次，在研究选题上，既要满足现实需求，又要在某种程度上乐于和敢于选择“冷门”对象国和研究问题。比如，国内非洲史研究较为关注英语非洲国家，尤其是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区域大国，而对法属非洲国家和葡属非洲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笔者曾发表关于安哥拉著名诗人、民族主义者维里亚托·达·克鲁兹（Viriato da Cruz）的研究论文，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少有涉及的研究话题。^③ 建设一个全面和可持续的非洲史学科，需要学者勇于打破研究舒适区，探索新颖的研究课题。最后，重视人才培养。目前，国内开设非洲研究或非洲史相关课程的高校非常有限，很多非洲研究中心并不具备招收本科生的资格，错失了及早培养优秀人才的机遇。对已开设非洲史相关课程的教师来说，如何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开拓研究视野，完善知识体系，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

（责任编辑：贺杨）

-
- ① 比如，由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领衔，“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于 2017 年正式启动，计划出版 7 卷本的文献史料，类似这样的文献和口述史料成果必将大大推动中非现代关系史研究。
- ②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高校学者和学生都有机会开展田野调查，即便是非洲研究的硕士生，都会在学校资助下选择前往其研究对象国从事不短于一个月的田野调查。
- ③ Jodie Yuzhou Sun, “Viriato da Cruz and His Chinese Exile: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6, No. 5, 2020, pp. 845 – 861. 此外，蒋华杰的研究涉及安哥拉，但是在中国援非政策的视角下论述的。参见蒋华杰：《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外交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121—154 页。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main practitioners of aid projects, the main force of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China – Africa institutionalized program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in 2000, the role of the youth as the main force in China – Africa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has become further highlighted. Young peopl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te governance, inter – party exchang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the youth i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has been raised to a new strategic height. Young people should inherit the spirit of China – Africa friendship, uphold the “Four Proposal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Nine Programs”, and carry 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so as 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and the building of a high – level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he role of the youth,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Nine Programs”, the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uthors: Zhang Liping, Ph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Wang Heng,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The History of Africa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Sun Yuzhou

Abstract: The trend of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f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nd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cholars in the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In this paper, by reviewing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author mainly elaborates on three new research trends: first, the use of multiple typ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especially the acquisition and use of archival documents from African countries; second, the decentralized approach which emphasizes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interaction within African countries; third, the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factors such as race, ethnicity and religious belief on Africa’s external relations.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s helpful to reflect on the continuous force exerted by Cold War thinking on today’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the history of Af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decolonization

Author: Sun Yuzho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2).